

客家研究輯刊

THE PERIODICAL OF HAKKA RESEARCH

2006 年第 2 期(总第 29 期)

NO. 2 2006(Vol. 29)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Hakk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

客家综论

论 1640 - 1940 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 陈春声(1)

《建设周报》风波之再认识 张卫东(15)

客家文化中心转移变迁说 吴永章(18)

台湾都会客家的隐形化现象

——台北市与高雄市的比较研究 丘昌泰(23)

客家社会经济研究

明清时期宁都地区的佃农抗租活动 许怀林(39)

明末清初粤东客家乡村社会变迁

——以大埔县白埃村为中心 肖文评(54)

台湾西部开发的客家经验

——以桃园台地为例 陈国彦(65)

由土地资源观点比较客家人的迁徙现象 温绍炳(69)

梅(州)河(源)高速公路沿线客家文化景观规划研究 宋德剑(84)

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与研究

三僚村风水文化考察 刘晓春(93)

尖山:一个客家村落 17 - 19 世纪的迁台 张小聪(103)

台湾六堆客家敬字文化研究 吴炆和(114)

从围龙屋的文化功能看其历史文化积淀

——以粤东梅县丙村仁厚祠为重点分析 房学嘉(128)

从台湾地方祠堂看中原文化的播迁

——以新竹新埔双堂屋刘宅为例 邱荣裕(134)

客家文化艺术研究

何物偷情客家山歌

——与叶春生先生商榷 刘佐泉(140)

论客家民间艺术的品类特征与传承发展	林爱芳(144)
梅州古村落系统研究的几点思考	李婷婷(153)

客家方言研究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张佑周(157)
梅县境内方言语音的异同	侯复生(164)

客家妇女研究

赣闽粤客家妇女精神特质及其生态环境缘由	童绍茂(167)
---------------------------	----------

客家名人研究

何南凤“黄(横)山堂”考	王 旭(171)
丘逢甲黄遵宪“争雄”与诗界革命	张应斌(181)

客家新著评论

历史·文化·文学:宏观叙事下的客家文化与文学 ——评钟俊昆《客家文化与文学》	邹春生(188)
---	----------

活动动态

“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简报	李海冬(190)
“客家研究与教育”圆桌会议纪要	张小聪(193)

论 1640 - 1940 年韩江流域民众 “客家观念”的演变

陈春声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在“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韩江流域,把“客家人”视为一个族群的观念,是在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该地域百姓口耳相传的关于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人群分类观念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族群分类意识的传入、近代教育的推广和近代城市兴起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1933年,罗香林先生出版其影响深远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该书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提出了“客家”的定义:

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为“客家”(Hakka),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也是中西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极为注意的一个汉族里的支派。^①

这段话所反映的罗先生有关“客家”的看法,至少包涵了如下三方面的内容:1. 客家是一个“民系”;2.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派;3. “客家”不但是一个来自外人的他称,也是这个民系的自称。这一简洁而合乎近代社会科学分类法则的定义,被许多后起的研究者所沿用,已经成为学术史意义上的“常识”。

近10余年,罗先生的研究亦受到诸多有说服力的批评,特别是在其有关客家源流的论证方面。论者以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包括现代遗传学研究的若干可能证据,说明罗先生有关客家先民原居住于中原,东晋以后经过五次大迁徙,最终形成目前的地域分布格局的说法,在史实和学理上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批评者亦在此基础上,对客家人的源流,特别是客家族群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提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推测^②。

作者近年来一直在韩江流域乡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带着实地调查的体验,重新阅读相关文献,就很自然地注意到,罗先生有关客家人祖先来源于中原的说法,不仅存在于他所依据的客家人

[收稿日期]2005-12-18

[作者简介]陈春声(1959-),男,广东揭西人,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② 参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辉、潘悟云等《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遗传学报》30卷9期(2003年),页873-880。

的族谱之中,而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百姓的“历史记忆”中。所以,或许在学术史上更有价值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指出罗先生在资料运用和史实描述方面的缺憾,而应该尽可能带有某种“知识考古”的性质,去探讨罗先生所表达的有关“客家”的观念,在号称客家人聚居核心区的韩江流域中,是如何通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逐渐形成的。

二、“九军之乱”所见之“语音不类”问题

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其上游分汀江和梅江两支。汀江发源于福建省长汀县和宁化县交界处,梅江发源于广东紫金县,汀、梅两江在大埔三河坝汇合后,始称韩江。韩江南下直出丛山夹谷,在潮州城下,再分北溪、东溪、西溪等几道支流出海。潮州以上为韩江上、中游地区,多山地丘陵,主要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韩江下游是三角洲平原,其居民以讲福佬话者居多。在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设立嘉应州之前,韩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为潮州府所辖。直至20世纪初年,具有近代“民族”色彩的“客族”和“土族”(指讲福佬话的人群)分野被清楚界定之后,正在努力塑造“客族”意识的著名客家知识分子温廷敬,仍然在报纸上连载长篇文章,论证整个韩江流域同属一个区域:

夫吾等所居之州郡,非潮州与嘉应乎?潮、嘉为人为之区画,而实具天然之流域。今虽分为二州,向实合为一府。程乡、镇平、平远,本为潮州之隶属;兴宁、长乐,虽割自惠州,然以地势论之,固与潮州属同一流域。……我粤省为西江流域,而东有东江,北有北江以会之。自惠州以西,韶州以南,皆脉络贯通,联为一气。独我潮、嘉,山脉异向,河水异流,坐是之故,民情风俗,自成一派,与省会绝不相同。皆受此地理之影响也。^①

传统上,中国人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潮州人”、“开封人”或“泉州人”时,更多的是指其郡望或籍贯,而非族类。至迟从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②开始,“潮人”或“潮州人”一直是作为一个与地望相关联的概念被使用的。雍正十一年新设的嘉应州,其居民大都讲客家话,但该州大部分地域原来是潮州府辖地;而在设立嘉应州以后,潮州府各县内仍有大量的讲客家话的人群存在,其中大埔、丰顺二县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有清一代,韩江中下游地方讲客家话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自称为“潮州人”。无论如何,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与“潮州人”相对应的“客家人”的族类概念,是不存在的。

“客家人”最容易被识别的标志之一,是其被称为“客家话”的语言。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韩江流域最早出现的以语音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见于雍正《揭阳县志》有关清初该县发生的“九军之乱”的记载。

从16世纪开始,韩江中下游地方因为与“倭寇”、“海盗”和“山贼”问题有关等一系列事变的影响,长期处于所谓“动乱”的势态。清代最初的近40年时间里,地方上继续动荡不安。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几十年的战事是在南明与清朝两个政权并存,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的情景下进行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③。所谓

①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第1版。

②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乾隆《潮州府志》,页1038-1039。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③ 有关明末清初韩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动乱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可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嘉靖“倭患”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九军之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事起于顺治二年（1645）。据雍正《揭阳县志》记载：

（顺治二年）石坑贼首刘公显统九军贼聚蓝、霖二都以叛，札营南塘山水陆交会之处。九军者，曾铨、马麟、马殿、马登、傅达、丘瑞、黄甲、吕忠、吕玉。又以潘俊为东军，陈云任为南军，陈汝英为北军，陈佩如为西军，凑为十三军。又以温韬鲁为都军，吴元为大将，曾悉昭为二将。共十八将，其余贼首数以百计。擅立伪号，曰后汉大升元年。立五大营，十三大府，铸印选官。妖贼矫诬如是。^①

“九军”起事之蓝田、霖田二都，在揭阳县西部，历来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之地。从当时的记载看，他们与聚居于揭阳东部的讲“福佬话”的所谓“平洋人”，似乎已经有颇深的矛盾。“九军”一起，就被“平洋人”称为“猪贼”，“九军之乱”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规模特大的械斗：

猪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憎其语音不类也。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②

从这段记载可以明显看出，这次械斗确实起因于“语音不类”的方言群之间的矛盾，类似于后来在台湾经常发生的某种“分类械斗”。在由“平洋人”撰修的县志中，“客”字被加上了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豸”偏旁，但无论如何，这段记载还是清楚表明，在1640年代的韩江流域，“客”作为一个方言群的称谓，已经被普遍接受。在平洋人的笔下，“九军贼”的横暴行径简直罄竹难书，顺治三年（1646）九月，“九军”攻破揭阳县城，严刑酷法，毁坏典章文物，杀害了大批乡绅：

钉锁于天中，以猛火燃迫，至于皮开肉绽。掘坎于地下，以滚汤灌渍，至于体无完肤。多以纸浸油，男烧其阳，女焚其阴，异刑不能殫述。

各贼分宅镇营，杀戮乡绅士庶。杀进士许国佐、黄毅中，推官邢之柱，知县谢嘉宾，举人杨其华、黄三槐、杨世俊，贡生林鼎辅、谢联元，武举杨德威，都司黄梦选，监生王之达、郑之良，例贡郭之章。通县生员被杀七十余人，饥寒因以病故四十余人。

抢掠妇女，尽驱入山。所至破棺碎木主，贼名之曰“辟死鬼”。

贼毁文庙，劫城隍，开库狱，焚黄册。^③

揭阳县城位于揭阳县东部“平洋”地方，历来为讲“福佬话”的人群聚居之地。

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雍正《揭阳县志》的记载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九军之乱”的起因与“语音不类”有关，由于是次动乱涉及揭阳全县的广大地域，可见其时已存在超越邻村之间相互矛盾的方言群的分类意识；二、与“猪贼”相对应的讲福佬话的人群自称为“平洋人”，在潮州话中，“平洋”即“平原”之意。

三、“迁海”与“复界”对族类关系的影响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一百多年间，韩江流域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的地方政区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出现某些军事化的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其中，康熙初年对沿海居民实行“迁海”的政策及其随后“复界”的安排，对韩江流域族类关系的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① 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

② 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

③ 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

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①,“应迁之地,插标为限,拆墙毁屋,以绳直之。界内人夫发开河沟,深广各一丈,余筑墩台,派兵守望。”^②潮州沿海数十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在“迁界令”之下,韩江下游的民众被安插到中上游山区定居,如澄海县在康熙三年(1664)奉旨裁撤,县民全都被安插到程乡县。清代潮州有句民谚,所谓“澄海无客,大埔无潮”^③,意即澄海全县居民都是讲福佬话的。这么多讲福佬话的人群,被安插到讲客家话人群聚居的韩江中上游山区居住,无疑是对当地的族类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今日我们所见的所谓“客家典型民居形式”土楼的地理分布状况,与“迁界”也有直接的关系。作者曾经指出,由于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长达百年的激烈社会动荡,当时韩江流域出现过一次持久“筑城建寨运动”,乡村社会的军事化是该时期地方社会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到明末的时候,该地区乡村的聚落形态已经与前大不相同,现在韩江流域主要的“大乡里”(大村),几乎都在嘉靖至崇祯期间有过一次重新整合并“筑城设防”的过程^④。以澄海县为例,至明末该县重要的居民点,几乎全部成了军事堡垒:

在下外为冠陇寨,在上外为刺林寨;在中外为渡头寨;在苏湾为程洋冈寨,为南湾寨,为樟林寨;在蓬州为歧山上寨,为歧山下寨,为下埔寨,为鸡汀背寨,为外沙上、中、下寨;在鹄浦为水吼桥寨,为湖头市寨,为厚陇寨,为月浦上、中、下寨,为长子桥寨;在蛇江为蛇浦寨,为莲塘寨,为大场寨。以上诸寨百姓因寇盗充斥,置寨防御,自为战守。^⑤

这一以“筑城建寨”为标志的乡村社会的军事化趋势,对韩江流域的地方文化,也有长远的影响。同治年间先后署潮阳、普宁、澄海三县和潮桥运同事的江苏如皋人冒澄,曾著文讨论潮州人“好狠斗勇,嗜利轻生”现象产生的根源,认为其形成与明代后期“筑围建堡”的历史过程有关:

民情强悍,好勇斗狠,嗜利轻生。乡村聚族而居,烟户繁密。明末海盜纵横,民多筑围建堡以自卫,久而乡无不寨,高墙厚栅,处处皆然。其弊也,莠民藉以负固,敢于拒捕抗粮。官吏捕治为难,半由于此。^⑥

明代后期在韩江流域东侧及其相邻地区开始出现的土楼建筑,其实就是这一“筑围建堡”过程的一部分,其建筑和居住者并没有方言群体的差别。清代康熙初年“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沿海数十里的民房被清拆一空,当然也包括土楼在内。执行“迁界令”的结果之一,就是土楼只存留于迁界范围之外的内陆山区,而内陆山区主要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之地,这就导致了土楼被视为“客家典型民居形式”的看法的出现。其实,时至今日,也仍有大量的讲福佬话的人群,居住在土楼建筑中^⑦。

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开始“复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因“迁界”而移居韩江中上游山区的沿海民众陆续回迁原居地,原在山区居住的讲客家话的人群也随着向外迁徙,移居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区,以及广西、江西、四川、台湾等地,这

① 《广东新语注》,页4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事纪》。

③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吴榕青:《试论粤东闽语区的形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载《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⑤ 康熙《澄海县志》卷11,《兵防》。

⑥ 冒澄:《潮族偶存》卷1,《潮阳县地輿图说》。

⑦ 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就形成了罗香林先生后来所描述的所谓“客家迁移运动的第四时期”^①。罗先生也一再强调此次“客家迁移运动”与“复界”的关系：

抑近世中国历史之发展，与清朝对郑成功父子之据地抵抗拒，而严令闽粤沿海五十里居民，划界内徙，有甚钜关系。而客家先民之迁居沿海省分，亦即因迁界后之复界与招垦官荒而引起。^②

从当时的各种记载看来，这一时期从韩江中上游地区移居外地的人群，已经很清楚地被称作“客”。例如，蓝鼎元在雍正二年（1724）所写的《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是这样描述这个人群的：

广东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之人赴台佣雇佃田者，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数百人，谓之客庄。客庄居民朋比为党。睚眦小故，辄哗然起争，或殴杀人匿灭其尸。健讼，多盗窃，白昼掠人牛，铸铁印重烙以乱其号（台牛皆烙号以防盗窃，买卖有牛契，将号样注明）。凡牛入客庄，莫敢向问；问则缚牛主为盗，易己牛赴官以实之。官莫能辨，多堕其计。此不可不知也。^③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这类记载中，还不能明晰地分辨出“客子”或“客庄”之类的称呼是否已经成为这些人的自称。

18世纪的韩江流域的地方志，除前引雍正《揭阳县志》有关“九军之乱”的记载外，也未直接用“客”来自称本地讲客家话的方言群体，但不同方言存在的事实，则或多或少地受到关注。以康熙《程乡县志》为例：

李士淳曰：风俗与化移易，今古相悬，因地变迁，南北回别。以一郡言之，则郡人土音近于漳泉，程人土音近于汀赣。程人恂懦无华，郡人巧猾多智。^④

康熙《程乡县志》修于康熙三十年（1691），其时程乡县尚未改为嘉应州，仍是潮州府的属县。上引记载明确指出了“郡人土音近于漳泉，程人土音近于汀赣”的事实，而“郡人”与“程人”这类以地域为划分标志的概念，也包涵了方言群的意识。讲福佬话地区的方志，也同样注意到潮州府内部不同县份方言的差别，乾隆《普宁县志》“方言”部分就指出，讲客家话的大埔、丰顺二县的方言，与其他县份明显不同：

普于潮郡诸邑，大约与三阳、澄海同，与惠来、饶平大同而小异，至大埔、丰顺，则悬远不相通矣。^⑤

四、族谱纂修与祖先来源“历史记忆”的塑造

作者曾经指出，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社会的动乱与“转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清初的“迁界”，实际上是清王朝在地方社会“民”“盗”难分，政治与文化的“正统性”严重混乱的情形之下，所实行的重建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沿海数十里之内的百姓在官府驱赶之下背井离乡，生计无着，自然苦不堪言。但是也必须看到，“迁界”以后，影响地方社会达一百多年的“海盗”和“豪强”的力量不再活跃，乡村的军事设施和军事组织（特别是“乡兵”）的重要性也远不及明末，被划于“界外”地区的军事性城寨基本被拆毁，“复界”之时乡村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地方社会的动乱局面，正是在“复界”之后逐渐完结的。康熙中期以后，韩江流域乡村的社会控制形态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6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②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页7。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

③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甲辰）》。

④ 康熙《程乡县志》卷1，《舆地志》，页18。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

⑤ 乾隆《普宁县志》卷8，《方言》。

与社会组织,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①。“复界”以后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宗族组织终于成为乡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祠堂、尝产和族谱等相应的普遍出现。

正如多位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明代后期华南地区出现过明显的“宗法伦理庶民化”倾向,嘉靖以后,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得到推广,这实际上是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 程^②。不过,至少在韩江流域,要到 17 世纪末“复界”以后,宗族组织才在乡村社会中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治形式。罗香林先生《客家史料汇编》一书,收录了他数十年间所收集的 40 姓 86 种族谱有关“客家源流”的资料,这些族谱全都是 18 世纪以后才编修的。

这些族谱大都对本族迁徙的历史有较多记载,其祖先源流故事的基本结构,可以丰顺《吴氏族谱》的描述为例:

太始祖由江南入闽省地方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结庐课子及孙,讳承顺公,妣邹宜人。二墓葬于彼石壁村,坐东向西。……公妣生三子:长坎一公,仍回江南大宗祖居;次坤二公,三震三公,后裔析分江、浙、闽、广等处,今亦颇盛。……^③

上述故事中始祖从中原或北方地区移居闽西宁化县石壁村,再有石壁村迁居各地的说法,是讲客家话的人群中流传最广的关于宗族源流的描述。这种说法,至迟在明末清初已经存在。明清之际在韩江流域地方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丰顺吴氏族人吴六奇,就这样回忆童年时听到的有关祖先来源的说法:

忆方幼龄,即闻诸祖考云:我先人来自宁化石壁,与杭之汤湖,共为一脉。虽以闽粤异处,支派遍分,未得遽详世系,然遗言在耳,心中固耿耿不忘也。^④

吴六奇明末是一个山贼,为所谓“五虎乱潮”者之一,清初降清,出任专为平定地方社会动乱而设置的饶平总兵,为把明郑势力逐出潮州沿海地区,立下汗马功劳:

福建汀州人,海阳籍,明末踞大埔、程乡、饶平等处,亦五虎乱潮之一。后投诚,授饶平总兵,平潮有功。^⑤

吴六奇在《吴氏族谱》的“序言”中谈到孩童时代即已从先辈口中获知祖先源流,揭示了族谱在保留此类“历史记忆”并赋予其“正统性”方面的重要作用。18 世纪以后宗族组织的普遍建立和族谱的大量编修,无疑是有助于这类“历史记忆”的强化和推广的。

再以 19 世纪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为例,说明这种传说的影响之深。黄遵宪是嘉应州人,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作的这组诗,有多首谈及客家的源流与文化^⑥,其中一首为:

筲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

诗后“自注”云:

客人来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五代时,有九族随王审知入闽,后散居八闽。今之州人,皆由

① 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载《明清论丛》第 2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②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 159-162,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③ 丰顺《吴氏族谱》,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页 67。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 年。

④ 吴六奇:《吴氏渤海堂谱序》,载丰顺《吴氏族谱》,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页 66。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 年。

⑤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 3,页 108。台湾: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

⑥ 张应斌、谢友祥:《黄遵宪的客家源流观》,《汕头大学学报》2000 年 1 期。

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

可以看出,关于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原的说法,对于讲客家话的人群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从大人的口耳相传之中,从本族的族谱中,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此类解释。后来被罗香林先生誉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①的嘉庆年间和平人徐旭曾的《丰湖杂记》,也就是保留于和平《徐氏族谱》中的一段记载: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节,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庄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余口讲,博罗韩生,以笔记之(五月念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厓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为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讐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

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真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湘、粤边境,毗邻千数百里之地,常有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②

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③

《丰湖杂记》作于嘉庆十三年(1808),其有关客家源流的描述中,以下几点是值得特别引起注意的:1、嘉庆年间在讲客家话人群与讲广府话人群聚居地交叉相邻的东江流域下游地区,两个方言群体发生过激烈的“土客斗案”;2、徐氏描述的有关“客人”源流的故事,已经超越了个别宗族对其祖先来源的追忆,而是成为整个方言群体对其共同来源的解释;3、这种解释包含了与国家兴亡直接相关的内容,被赋予了强烈的“忠义”的意涵;4、“客人”是“土人”对于后来移民者的称呼,但已经被后者接受为本群体的“自称”;5、“客人”与“土人”最明显的识别标志,就是语言。徐旭曾是和平县人,和平县在东江上游地区,与嘉应州相距不远,人员来往密切,但该地不属韩江流域。不过,徐氏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在户部任职,丁母忧后不再为官,但长期掌教广州越秀书院和惠州丰湖书院,其识见不囿于一乡一族,所描述的客家方言群的聚居范围,已经包括了粤、闽、赣三省的大片地区,即所谓“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所以,可以假定《丰湖杂记》所表达的讲客家话的人群有关自己群体的看法,在当时的韩江流域也可能存在。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② 和平《徐氏族谱》,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页297-298。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

③ 和平《徐氏族谱》,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页298。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

必须指出的是,此类关于自己是历史上移民的后代的传说,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尽管在一般的历史解释和教科书的描述中,中国人常常被赋予“安土重迁”的禀性,但有意思的是,在现存的数以万计的族谱中,在乡村父老口头流传的说法里,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乡民们的先祖从外地迁移到本地定居的故事。最为人所熟悉的,除了客家人从福建宁化石壁迁徙到各地的故事、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中所流传的珠玑巷的传说、广东整个讲闽南语系方言的人群都来自福建莆田的说法外,还有整个华北都广泛流传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传奇。连西南地区现在被定义为彝族、苗族和侗族的人群中,也普遍流传着自己祖先原来居住在江西吉安府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虚拟的”的移民社会。只要有机会到乡村与老人们谈谈,就会明白,中国普通老百姓关于其先祖来自另一个他们实际上并不熟悉、但在历史上教化程度可能更高的地方的观念,是如何的普遍和根深蒂固。徐旭曾的贡献,是在广泛了解各个地区有关传说的基础上,根据族谱的记载,将一个一个家族的故事,塑造成为一个以方言为主要识别标志的人群的集体的“历史记忆”,在他的描述中,“客人”成为带有某种“族群”色彩的人群。

不过,《丰湖杂记》在形成之后的100余年间,只是保留于和平《徐氏族谱》之中,并未广泛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客家“族群”意识的自觉,是与近代西方“种族”观念的传入和近代城市生活的出现,直接相关的。

五、近代城市生活与“族群”意识的自觉

具有近代“种族”意涵的客家族群意识的形成,无疑与清代咸丰至同治年间发生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边缘地区的“土客斗案”直接相关,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郭松焘在《会奏查办土客案疏》中简述了事件的原委:

论事之缘起,为匪者土民,助官攻匪者客民,客民顺,而土民逆。论事之终竟,为匪者乱民,与士绅无与,客民因以土匪为仇而助官,其蓄意已深;因剿匪而戕及士绅,柯曼无已,其斗杀尤惨;迨至窜居广海城寨,至于抗官犯顺,是土民顺而客民又逆。^①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事变中,与“客民”相对者被称为“土民”。事平之后,多位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报道、研究了事变经过,并正式用“人种”之类的术语来描述这个方言群体。关于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及当时西方研究者的观念,对客家“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已有所讨论^②,近年还有几位学者做了相当出色的研究^③,本文不再赘述。

除了“土客大械斗”这类激烈的冲突事件之外,近代城市的兴起以及城市日常生活接触中引发的族群隔阂问题,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客家族群观念得以强化和普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作者感兴趣的是,汕头市的兴起,在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变化过程的作用。1860年代末期,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位于韩江入口处的小渔村汕头成为通商口岸。随着机器轮船业的发展,这个口岸在几十年间迅速成为“中国通商第四口岸”^④。著名的客家学者温廷敬在《潮嘉地理大势论》中,这样描述汕头的地位:

以近海之故,民多冒险出洋。南洋诸岛之利权,潮嘉人几握其半,皆海线之关系也。然其缺点者,则以二百余里之海线,而可泊大舰者,仅有汕头一埠。^⑤

① 瑞麟、郭松焘:《会奏查办土客案疏》,见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7-8。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③ 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页387-4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④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第4版,《潮嘉新闻·集股行轮》。

⑤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版。

汕头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成为整个韩江流域唯一可以停泊机器轮船的口岸,潮州府和嘉应州两地的商人都竞相在这个新兴的城市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中许多人是先到了南洋、香港、上海等地做工或经商,在侨居地赚了钱,再回来汕头一带发展的。有意思的是,汕头周围韩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大型基础建设,都是韩江中上游的客家商人兴建的。如民国九年(1920)建设汕头至樟林轻便铁路的是大埔百墩乡人杨俊如^①。而光绪三十年(1904)动工,三十二年(1906)落成的潮汕铁路,从倡议兴建到投资建设,主其事者是嘉应州最著名的华侨商人之一张煜南^②。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由客家人在汕头主办的《岭东日报》就在“潮嘉新闻”栏中积极报道张煜南等人的活动,还就修建潮汕铁路种种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该年十月连载的“条陈利弊”文中,有“开铁路以浚利源”一节:

汕头为通商口岸,货物充盈,潮州粟米不敷,需籍海米以接济。近来梅溪水浅,舟楫难通,虽有浚河局日日去沙,然潮州地势低洼,一遇洪流,上流之水即挟泥沙以具来,梅溪之淤塞如故。去岁汕头海米山积,因船不能运,郡城斗米几至千钱,人心以寒,商务以败。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古今有同慨焉。

潮州出口之货,以糖为一大宗。糖不能往,米不能来,议者谓宜浚河道。然千夫之努力,不敌一水之怒奔。盖此水由嘉应地面而来,嘉应产杉,伐木开山,山崩土裂,春水暴涨,泥沙即顺流而下。虽日日浚河,于事仍属无济。

生谓似宜开筑铁路,人货自得流通。不必动库银,不必借洋债,设立公司,售卖股票,以殷商总理其成。且今日本国不开,后来必有外人开之者,坐使无穷之利益,拱手而让之他人,虽悔曷追也。^③

这里讨论的是修铁路以解决汕头至潮州间的运输问题,实则与汕头至嘉应州的交通大有关系。潮州城位于韩江三角洲平原的顶端,韩江干流过了潮州,即开始分流,最后分19口入海^④。分流之后水势自然变小,结果,枯水季节韩江下游航运往往受阻,而潮州府城以上河段反而比较容易通航。实际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但潮州府城米贵,嘉应州也是“各属连年歉收,米价昂贵。况今旱象已成,冬收无望,全赖海米流通,籍资接济”^⑤的。所以,张煜南等人倡建潮汕铁路,对解决韩江上游的丰顺、大埔、嘉应州一带与汕头这个大港市间的运输问题,是大有裨益的。实际上,不但嘉应州的货物和人流要经由汕头出入口,而且其邮政、金融活动也以汕头为中心,对嘉应州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侨批业,也完全以汕头为枢纽^⑥。

因为这样,汕头也逐渐成为整个韩江流域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潮州和嘉应州的许多文人,不管是讲什么方言的,都集中到此地活动,许多人也就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在此地办学堂、出报刊、编撰书籍,许多事情都是面对潮、嘉二地的,实际上没有特别的福佬或客家的界限。例如,光绪二十八年,温仲和与丘逢甲、温仲和等见客家话的师友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是为粤东办新学的先声,该学堂就潮、嘉二地学生兼收。《岭东日报》除了论说、谕旨、专件、时事要闻、本省新闻、京都新闻、外国新闻等栏目外,另有篇幅较大的“潮嘉新闻”专栏,专门刊登潮州和嘉应州各地的来稿,报道地方上的各类新闻。在报纸的时评中,往往也是“潮、嘉”并称的。

在“潮嘉新闻”中,我们很难看到“客家”和“福佬”两个方言群冲突和分界的具体例证,日常生活

① 芮治璠:《汕樟公路见闻录》,《汕头文史》第5辑,页129-138。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

② 王琳乾:《潮汕铁路兴废始末》,《汕头文史》第4辑,页76-80。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

③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第3版,《潮嘉新闻》。

④ 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围海造田和并围堵口的工程,现在韩江只有5个入海口。

⑤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廿一日,第2版,《潮嘉新闻》。

⑥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中更多发生的,还是所谓“姓自为争,乡自为斗”这类土、客二族内部“歧中又歧”的现象^①。所以,尽管比较上层的、受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们,已经将日常生活中有关语言和习俗差别而产生的体验,逐步发展为一个超越了乡族界限和行政区划范围的种族的理念(详下节),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要面对的问题,要更为复杂和充满动态,生活与理念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距离。这也是当时许多客籍文人一直把整个韩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缘由之一。

不过,两个方言群体的存在,毕竟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平时的乡村生活中,村民们生活在从小就已经习惯的环境之中,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因另一个方言群体的存在而产生的与身份或认同有关的问题。但到了城市之中,周围朝夕相处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这种因为接触而产生的认同或分类的感觉就变得明显起来。当时汕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馆,即所谓“潮属有万年丰会馆,嘉属有八属会馆”^②。有意思的是,属于潮州府的大埔和丰顺二县商人不属于万年丰会馆,而是参加了八属会馆。如前所述,这两个县的居民大多讲客家话。

《岭东日报》所载潮州中学堂的情形,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友人来函云:潮州中学堂分教某君尝对人云,本年中学堂之学生,惟澄海最有进步,若大埔学生则多不上讲堂,殊少进益。按大埔学生之多不上讲堂,以堂中分教二人皆操潮州土语,语音不通之故。然业已负学生之任,纵格于语音,不能上堂听讲,何不借学堂为自修之地。大埔学生勉乎哉。^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语言不同而产生人群分类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其实,就是兼收潮、嘉二属学生的岭东同文学堂,因为语言不同而产生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从学堂创办开始,就因为潮、嘉语言不同,设立两个“副办”,明确规定在潮州和嘉应州功名较高的士绅中各遴选一位出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该校更改用“按语言分班的办法,以嘉属人为一班,曰新后班,潮属讲客语之大埔人及揭阳之河婆人,也归入客语班。潮属人为一班,曰新前班”^④。

正是因为与不同人群的接触增多,许多文人开始对自己族群的“特质”及其优缺点一类的问题,如有笔名“双髻山人”者,在报纸头版发表《论大埔妇女之特色与其缺点》,论述了大埔妇女的四大特色和两个缺点,所论者与今日谈客家妇女特质的议论大致相同^⑤。嘉应州州绅还呈请知州,通飭劝谕本州妇女改变“高髻”的发式,在《岭东日报》上还发表“改装十二便”的文字,宣扬嘉应妇女改妆的好处,其理由之一为:“州妆一到汕头,必至聚众骇观,甚至有将该髻如香港博物院做古玩者”^⑥。在这些文人的心目中,新兴的汕头已经成为观察本乡风俗的一个具有某种合法性的参照物。

六、《岭东日报》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

在带有近代种族意识的“客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前文提到的由客家人在汕头创办的《岭东日报》起过很大作用。

《岭东日报》是粤东地区第一家地方性报纸,光绪二十八年(1902)5月18日在汕头育善街创办,社址原为当地的知名人士曾杏村、吴子寿等人开设的专门收集上海、香港等地的各家报纸供人阅览的岭东阅报所。该报主持人杨源(字季岳)是嘉应州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一起参与创办的还有温廷敬、何士果和陈云秋等人。该报每期8开4页,页中可对折成16开8版的小册子,售价为制

①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版。

②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第2版,《潮嘉新闻·浚河要件》。

③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第2-3版,《潮嘉新闻·学生宜勉》。

④ 杨勉:《汕头同文学堂始末》,《汕头文史》第1辑,页70-72。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

⑤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第1版,《论说》。

⑥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第3版,《潮嘉新闻·改装十二便》;又见该报同年三月初九日,第4版,《潮嘉新闻·改妆不成》;同年四月廿五日,第4版,《潮嘉新闻·劝谕改妆》。

钱12文。逢周六停刊。从其政治倾向看,《岭东日报》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清末支持革命派的报纸之一,曾发表过《论今日改革当以大赦党人为首义》、《读梁氏议国体问题书后》等社评,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生的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中,该报也有积极表现,并大力提倡拒用美货^①。温廷敬先后两度任该报主笔^②,对报纸的立场有重要影响。

温廷敬,字丹铭,号止斋,笔名讷庵。大埔县百墩乡人。早年就读潮州韩山书院,甲午战败后,为实现救国志愿,专心钻研西政西学,主张废科举,兴新学,促进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八年参与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他与杨源是诗友和知友,参与《岭东日报》的创办,并兼任主笔,时年34岁。后来,因同文学堂教务繁忙,一度辞去主笔职务,但仍在报纸上发表大量时评。光绪三十一年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运动中,有激烈言辞,为当局所不满,被迫辞去同文学堂讲习,再任《岭东日报》主笔。其子温原先生后来将其主持《岭东日报》笔政期间的时评收入《讷庵时论抄存》(稿本),凡50余篇,另外,所遗《补读书楼文集》稿本16卷,也收录有较多该时期他在报刊上的言论^③。

这份客家人创办、由客家人任主笔的报纸,从创刊之时开始,其评论中就一直有关于客家源流的论说。其中最集中反映这类观点的,当推温廷敬以“讷庵”的笔名,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至十一日,在报纸头版“论说”栏中连载的《潮嘉地理大势论》一文。该文分气候、地势、山脉、河流、海线和民族六个部分叙述潮州府和嘉应州的地理大势,其有关“民族”部分全文如下:

民族者,地理之主人翁也。故言地理者,必以民族为归。地理既殊,则民族亦因之而异。

潮嘉民族,分为土、客二族,嘉应全属,皆为客族;澄、普二县,皆为土族;海、潮、揭、惠,亦属土族,惟山谷之间,颇有一二客族错处;饶平、丰顺,则土、客各居其半;大埔亦客族,惟有一支自福建来者,尚守其土音不改,然实寥寥不足数。要之则山谷内陆,为客族根据地;海滨广斥,为土族根据地。

二族语音虽异,皆属中原故族,流徙而来。考诸家族谱,多始于唐末宋初,盖经黄巢之乱,随王潮入闽者。土族先至,据海滨之漳、泉;客族后至,据山谷之汀、杭。由漳、泉转徙,而居海、澄、揭、惠、普之地。由汀、杭转徙,而居嘉应、大埔之地。土族先至,且沿海多旧种之民,故其语音多因而转变。客族后至,且山谷少人迹之地,故其语音亦少变。此二族沿革之本末也。

客族以近山之故,故其民质朴忍耐。土族以近海之故,故其民活泼进取。然质朴者或流于困陋,活泼者每近于浮华。且客族以瘠土而多外出,土族以沃土而好家居,则性情又互为变易。要皆与地理有关系者也。

夫一国民族,必语言风俗统一,然后感情从之而生。潮嘉民族,已别于中原,又不能合于省会,其势已成隔膜。而土、客二族,歧中又歧。且姓自为争,乡自为斗,残杀之风,不绝于世。苟不讲求联络之法,其何能立于物竞天择、新种侵入之世乎?^④

这是作者目前所见韩江流域的讲客家话的人群中,较早以近代“民族”概念和进化论观点,系统地阐述自己族群的地位的文字。《潮嘉地理大势论》所述最值得关注者,不在于有关客家源流的观点,而在于有关“土族”与“客族”关系之论说。他之所谓“土族”,即后来关于教科书问题争论中所谓

①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页261,335,342,352,54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王琳乾:《汕头市新闻史料拾零》,《汕头文史》第2辑,页83,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鲁本斯:《辛亥革命时期潮汕报刊一隅》,《汕头文史》第1辑,页62-64。《岭东日报》停刊于光绪三十四年(见方汉奇前引文)。因年代较为久远,目前尚无一公共收藏机构完整藏有《岭东日报》。据笔者所知,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和汕头市档案馆都有所收藏,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则藏有部分复印件。作者收集、利用《岭东日报》的工作,得到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所长黄廷教授和汕头大学文学院陈锦熙先生的大力协助和指点,谨致衷心谢忱。

② 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汕头文史》第3辑,页102-116。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

③ 参见台北市大埔同乡会:《大埔县志·附:社团学校简介人物事略》,页82-84,台北:台北市大埔同乡会,1971年。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页102-116,《汕头文史》第3辑;《温丹铭著作及编校辑佚书目简介》,页117-128,《汕头文史》第3辑;《<温丹铭著作及编校辑佚书目简介>补遗》,《汕头文史》第5辑,页158-162。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④ 《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版。

之“福佬”^①。按照他的描述,客族、土族都是五代之时随王潮迁到福建的中原移民的后裔,只是因为福建定居的地点和再迁潮州的先后不同,而形成语音和习俗有异的二族。这里的“土族”讲的是福佬话,而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时讲广府话的“土民”。

光绪末年,广东顺德人黄节在上海国学研究会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中,认为客家人和福佬人“非汉种”,引起关于“福佬”和“客家”是否汉种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在带有近代“客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影响颇为深远^②。《岭东日报》在这场讨论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的“导论”中,略述其情形:

迨至光绪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顺德人黄节,于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广东乡土历史》,其第二课误据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輿地志》,谓“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客家人士,接阅此书,太为不满,乃出而联络南、韶、连、惠、潮、嘉,各属客人,设“客家源流研究会”一团体;嘉应劝学所复发起组织客族源流调查会,各发传单,遍告各地客人,根据闻见,著为论说,以暴露客家地源流。当时,主持其事的有邱逢甲、黄遵宪、钟用和等人。而汕头《岭东日报》主笔温廷敬,更能根据客家史实,与黄氏乡土史相驳诘,温所著有《客族非汉种驳辩》,及《与国学保存会论种族问题书》等文,均见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岭东日报》。^③

从现存的材料看,似乎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事,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而非罗香林先生所述之1905年^④。实际上,这是一场只有感到受伤害的一方单边在进行的论争。受到客籍学者强烈批评之后,上海国学保存会随即在报纸上告示,“拟于再版时改正,其余未经售罄之书概行停售”,并未坚持己见^⑤。十多年后,罗香林先生出版《客家研究导论》时,也相信“黄先生著乡土史时,当不至存有若何不良目的,然以其书为普通教科所用,故深为当时客家人士所不满,今则大家已‘释然矣’”^⑥。清末民初,正值广东东部讲客家话的人群政治和文化力量都空前发展的阶段,乡居的丁日昌、黄遵宪和邱逢甲等^⑦都是当时对地方政治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且都有相当杰出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在他们周围,还有温仲和、钟用和、温廷敬、何士果、邹鲁等一批在地方上有相当影响的文人和学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将论争变成了一场建构“客家意识”的运动。《岭东日报》也就成了客籍文人们发表见解的重要场所。

关于福佬和客家种族问题的论争开始后,温廷敬不但自己发表多篇评论,而且在报纸上刊载客家源流研究会同人的文章,以及地方官员更正乡土历史教科书的牌示^⑧。不过,在发表于《岭东日报》的《广东乡土历史客家、福佬非汉种辨》和《与国学保存会论客家、福佬种族书》中,温廷敬所述的有关客家源流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四年以前他在《潮嘉地理大势论》讲过的内容。直至民国32年(1943)出版的由他总纂的《大埔县志》卷12《人群志·氏族》^⑨中,有“客族来源考略”一段,所述道

① 饶宗颐:《福佬》,见黄廷编《饶宗颐潮州地方史论集》,页144-150。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载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第52期[1948年])

② 有关清末民初广东“广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观念的形成,可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和《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二文的研究。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5-6。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④ 黄节:《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上海: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释黄节编著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页401。

⑤ 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释黄节编著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页54,《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

⑥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27-28。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⑦ 如前所述,黄遵宪在《已亥杂诗》等著作中,对客家源流有诸多论说,但他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去世(钱尊、孙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钱尊、孙仲联辑《黄遵宪先生诗论评》,页12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应未能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参与有关《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的争论。

⑧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版。

⑨ 民国《大埔县志》卷12《人群志一》作者署名为“分纂丘星五辑纂”,所以,下引“客族来源考略”可能为丘星五所作。

理与数十年前也基本一致:

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客也者,土著对新来民族之称谓也。埔属民族全数为操客语之客族,推其始,盖由中州而来,故至今语音尚近中州。惟流转数千里,经过各省,淹留时日,自不免混杂多少各省方言,故或效南腔。或仍北调,此亦势所必至。^①

教科书事件前后,这些客籍文人以《岭东日报》为主要阵地,反复强调其关于客家来源的历史解释,这种做法至少达成了一个目的,就是根据族谱的记载,将一个一个家族的故事,塑造成为一个以方言为主要识别标志的具有近代“种族”色彩的人群的集体的“历史记忆”,通过大众传媒使这种记忆广泛传播,并在话语权方面取得明显的“正统性”。

七、《客家研究导论》的意义

1933年,任职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兴宁人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此书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也对“客家人”观念的形成和强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罗香林为了表示客家乃汉族的一部分,不用“民族”一词定义“客家人”,而发明了“民系”这个独特的表达方式,并且提出了将广东人按其不同的方言划分为“客家”、“福佬”和“本地”(广府)等三个“民系”的提法^②。这对在接近近代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表达有关“客家”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文献中有关讲客家话的人群及相对应的其他方言群体的描述,用词五花八门。例如,在雍正《揭阳县志》的作者看来,“九军之乱”中对立的双方是所谓“寇贼”和“平洋人”;在《丰湖杂记》的记载中,嘉庆年间与“客人”发生冲突的讲广府话的人群被称为“土人”;咸同间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被描述为“客民”与“土民”之间的冲突;黄遵宪《己亥杂诗》中讲的也是“客人”与“土人”的区分;到了温廷敬写《潮嘉地理大势论》时,用来表达者来个方言群体的是“客族”和“土族”。可见,可能是由于“客”这个词语字面上的涵义十分清楚,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之相对的人群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土”的涵义,而不管这些人讲的是什么方言。

直至因为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中,韩江流域地两个方言群体才被称为“客家”和“福佬”,这样的表达具有了比较清晰的以方言作为族群分类标志的意涵。尽管“福佬”一词其实只是“客家人”对韩江下游讲闽南方言(即“福佬话”)的人群的称呼,时至今日,这些讲所谓“福佬话”的人群,从未自称为“福佬人”,他们把自己所讲的属于闽南语系的方言,称为“潮州话”或“白话”^③。

《客家研究导论》提出广东人群分为“福佬”、“客家”和“本地(又称广府)”三个“民系”的说法,为“客家民系”概念的建构,奠定了与其他方言群平等并列的历史文化解释的基础。其实,在此之前,不管是作为“自称”还是“他称”,“广府人”的说法从未在方言群或“族群”的意义上被使用过。

《客家研究导论》以及后来出版的《客家史料汇篇》,利用大量的族谱资料,构建有关客家源流的历史解释,把有关家族祖先历史的个案的故事,提升为整个族群有关其源流和种族正统性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这一在学术史具有明显的意义转换性质的做法,对客家人身份标志的建立及其认同感的增强,还有其认同范围的扩展,都具有颇具实用性的意义。

综上所述,《客家研究导论》在“客家族群”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罗香林先生达成了将“客家人”定义“标准化”的目标,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客家人”有关其源流和

①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2,页1。台北:台北市大埔同乡会,1971年。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7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

③ 1950年代以后,由于原属潮州府但讲客家话的大埔、丰顺二县划归梅县地区,汕头地区各县主要以讲所谓“福佬话”的居民为主,结果,所谓“福佬”民系就开始被称为“潮州人”或“潮汕人”,“潮州人”才称为与“客家人”相区分的带有“族群”色彩的概念(参见黄淑娣:《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页200-331。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族群身份的“历史记忆”，使这些努力被普遍接受并相对稳定地流传了下来。

在结束全文之前，作者还想引用另一位具有“客家人”血统的学者在1940年代写的一段话，与《客家研究导论》的论述作一点比较。原籍大埔县，但几代人之前就已移居潮州府城的饶宗颐先生，1940年代主编《潮州志》，其“民族志”部分也谈到“客家”与“福佬”的关系问题：

客家、福老同为中原遗族，因迁入路线不同，故成为二系。然客语、福老语中其属于通语者，则雷同极伙，虽因同来自中州，且经赣、闽，多所接触故也。福老、客家以语言、礼俗为区别。其原操福老语者，移入客区则为客家；反之，客家入居福老语地区，其受同化亦然。百墩萧氏与潮阳同祖萧洵，今则纯为客家矣。松口饶氏、大埔杨氏迁往海阳不五、六代，而子孙不复操客语，亦为福老人矣。大埔氏族中，其原为福老迁入者亦不少，如大麻何氏、古源郭氏自潮安来，三河蒲氏自潮安塘湖来，高陂谢氏自潮安隆都来，三河戴氏自归湖来（详见《大埔志》氏族）。^①

对潮客关系问题研究又很深造诣的黄挺教授，在引用饶先生的上述论述之后指出：“饶公的意思是，客家人和潮汕（福老）人族源相同，只是迁入路线有异，客家人走陆路，经江西进入潮州，潮汕（福老）人到福建后，从水路浮海进入潮州。这两个族群的语言和民俗文化虽有区别，但是在相互交往之中，非常容易转化。文化转换的最重要原因，是居住地域的改变”^②。半个世纪前饶宗颐先生的这一判断，固然与其家世有关，更重要的是认真比勘各种族谱记载的结果。其实，只要认真研读《客家史料汇篇》引用的各种族谱的资料，自然不难发现，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

大约也是在半个世纪前，陈寅恪先生在其著名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这样论述中古时代的民族与种族问题：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或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典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③

陈先生的观点，虽针对中古史事而发，但对我们理解明清以降华南地区的族群或所谓“民系”的历史，同样有深刻的意义。陈先生的论述提示我们，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如果只是关注血统或与之相关的“源流”问题，则可能导致“无谓之纠纷”。从这一理解出发，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自然应该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深入理解这些可视为“共时态”的社会心理内容的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历时性”地重现常常被后人不经思索地作为身份或认同标志的各种“标签”或符号，是如何在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客家研究的学术史，特别是把客家作为“民系”进行的历史，也就是“客家人”形象被不断塑造，“客家人”的身份被不断强化，而其超越传统地缘意识的认同感被有心无意地培育起来的过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对罗香林先生等前辈研究者的工作，多一些理解和同情。

（校对：肖文评）

① 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2005年。

②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

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7-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